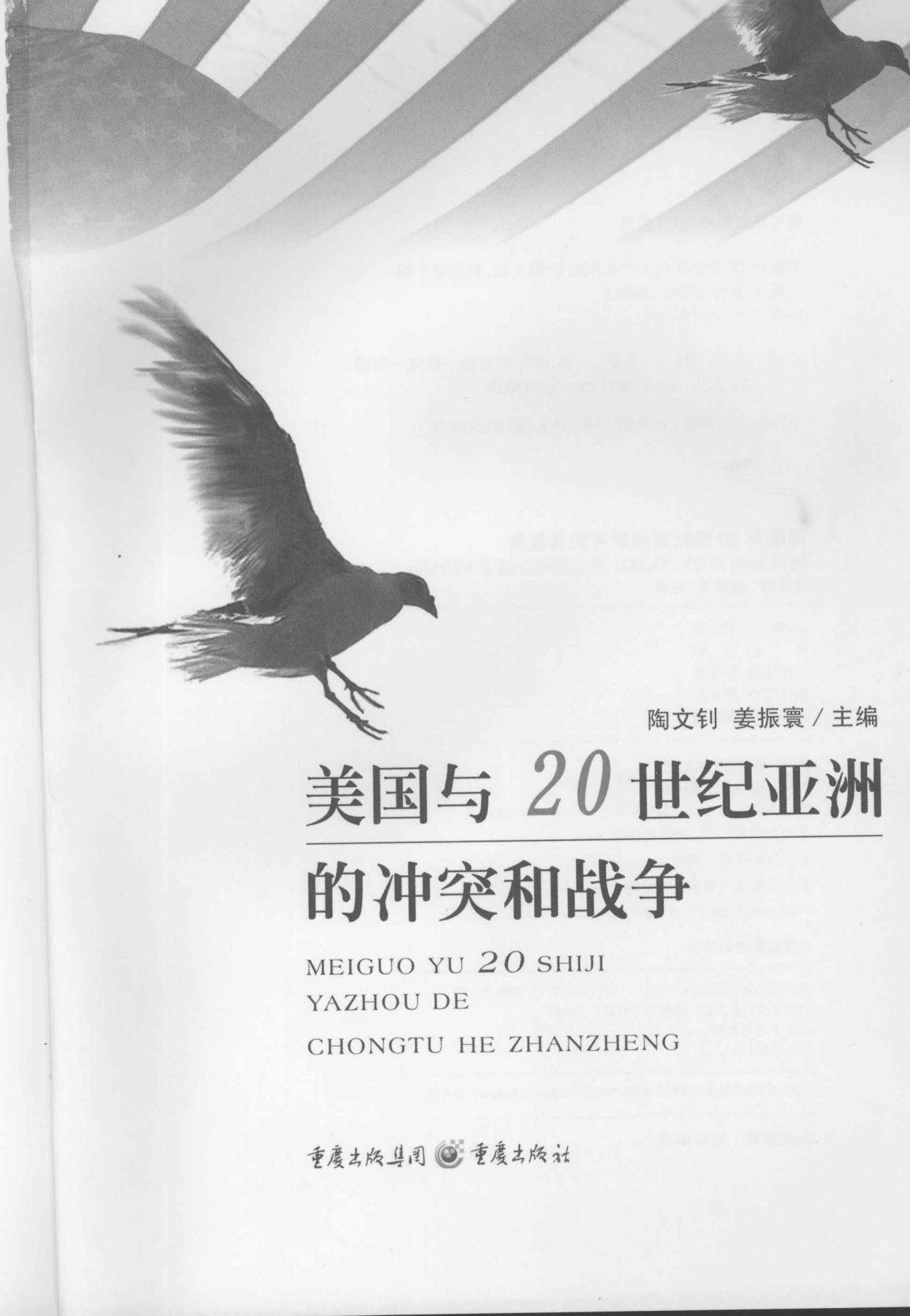




陶文钊 姜振寰 / 主编

# 美国与 20 世纪亚洲 的冲突和战争



陶文钊 姜振寰 / 主编

# 美国与 20 世纪亚洲 的冲突和战争

MEIGUO YU 20 SHIJI  
YAZHOU DE  
CHONGTU HE ZHANZHENG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与20世纪亚洲的冲突和战争/陶文钊,姜振寰主编.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5

ISBN 7-5366-7757-X

I.美... II.①陶... ②姜... III.国际关系史—研究—美国、  
亚洲—20世纪 IV.①D871.29 ②D830.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32810号

## 美国与20世纪亚洲的冲突和战争

MEIGUO YU 20 SHIJI YAZHOU DE CHONGTU HE ZHANZHENG

陶文钊 姜振寰 主编


出版人:罗小卫

策划:陈慧

责任编辑:张德尚

责任校对:娄亚杰

装帧设计:黄俊棚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图文制作部制版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书林图书发行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6.75 字数:306千

2006年5月第1版 200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 000册

定价:3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书林图书发行公司调换: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MEIGUO YU 20 SHIJI YAZHOU  
DE CHONGTU HE ZHANZHENG

MEIGUO YU 20 SHIJI YAZHOU  
DE CHONGTU HE ZHANZHENG

## 序 言

自 1982 年以来,中美关系史丛书编委会、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与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国中心、中山大学历史系、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西安外国语学院、厦门大学美国史研究中心、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学院等国内知名学府联合举办了十次中美关系史讨论会。范围涉及中美关系史的方方面面。学术讨论会的频繁举行说明了几个问题,第一,中美关系史研究是一个持续发展,比较繁荣的学科。研究者对这个学科的兴趣不减,比较资深的学者继续在这个领域里贡献智慧,后起的博士生、硕士生不断地加入进来,在中美关系问题研究方面施展才华,使学科的发展富有后劲,这对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第二,集中的学术研讨活动已经成为本学科学者的共同的学术园地。我们的许多学者是伴随着这些学术研讨活动成长起来的。在集中研讨期间,大家互相切磋,交流心得,思想碰撞,迸发火花。尤其对于年轻学者来说,在研讨中得以广泛接触各地学者,确实是学术成长的一个好场所。第三,在集中研讨中也会暴露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参加者可以直接地、面对面地得到同行的批评和指正。通过集中研讨这种形式也暴露了我们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使我们思考如何把中美关系的研究向前推进,笔者写在这里,以与同行共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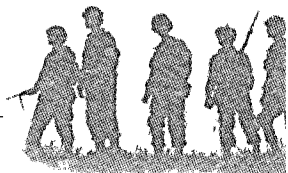
首先,要充分借鉴中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做博士和硕士论文的第一步是文献检索,看一看国内外对这一问题过去有过什么研究,有哪些主要的论著,而且要把这一部分写进论文。同行学者在审读时也总是先读这一部分,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对这一问题是否真有了了解。改革开放已经 20 多年了,对于中美关系中的许多问题,已经有学者做过研究,或者有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我们有些年轻的同行对这些成果不太了解,就在那里辛辛苦苦地做研



究,结果也花了不少时间,却没有比别人前进多少。已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前院长胡绳曾经批评学术界“低水平重复研究”的现象,我想,要避免这种现象,办法之一就是充分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要借鉴,首先就要了解,然后是鉴别,再进一步就是发展,纠正前人的错谬,对前人没有着重研究的方面加大研究的力度,或者提出新的视角,使用新的方法。总之,是在借鉴基础上创新。

第二,在挖掘资料方面下大工夫。但凡搞历史的人都注重史料。历史著作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写作的。许多史学工作者都有这个体会:写作的时候真是战战兢兢,最怕的就是史料出问题,即使十分注意这个问题,也还可能在史料方面出现问题,甚至一些大史学家也难以幸免。有时引用了别人的说法,以为没有问题,殊不知是以讹传讹,陷入了一个“学术陷阱”之中。要完全避免这种情况是非常困难的,但如果我们谨慎,如果我们在挖掘资料方面下大工夫,我们就可以减少这类问题。这不仅对于年轻学者是这样,就是对于做了几十年研究工作的学者来说,也是如此。他们要做出新的成果,也还要发掘新的资料。

资料的翔实和可靠是历史著作的价值的重要指标,这里举一个例子。美国著名中国学家费正清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专著《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使用了大量的中英文资料,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他来清华大学跟蒋廷黻做研究时故宫大内刚刚开放的档案资料。这些资料弥足珍贵。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严中平等所著《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把《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作为重要参考书,在注释中标出引用该书的就多达130多处。可见,作为历史著作,要想对学术界有些贡献,要想使论著有垂之久远的价值,资料的工夫是千万不能偷懒、不能马虎的,可惜,至今没有见到费正清大作的中文译本。第三,进一步拓宽研究的路子。这二十多年来中美关系史研究成果丰硕,许多题目都已经做了又做,于是,如何将研究深入下去就成了一个问题。实际上,许多题目虽已涉猎,但没有做深,大家的认识都停留在某个水平上。这里且举一些例子。200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是怎样参加联合国的组建的,在这方面中美两国间有些什么讨论和交涉?我们了解得还是不多。关于1948年美国《援华法》的出台,我们已经做了许多研究,但它的贯彻实行,我们知道得就很少。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个法没有寿终正寝,而是在台湾继续实行,并对国民党在台湾站住脚跟起了相当的作用,这个情况我们就更不清楚了。关于1949年以后的美台关系,我们的了解几乎仅限于政治方面,并略微兼及军事关系,如两次台海危机。但对于美台之间别的关系(在1979年中美两国建交时美台之间有50多项条约和协定,还有



其他安排), 大家就茫然了。对于一些历史人物也是这样。比如胡适, 在抗日战争初这个关键时刻出任驻美大使, 他的工作做得怎样, 对于中美关系有什么推动? 我们知道得也很少。总之, 在中美关系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都还有许多这样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把这些问题一个一个地做深了, 中美关系史整体研究水平就提高了。在这方面我们特别寄希望于年轻的学者, 寄希望于以中美关系史为题撰写博士、硕士论文的学子, 因为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从事这些专题研究。

在本书出版之际谈这些想法, 与学界同行和年轻朋友共勉。

陶文钊

2005 年 12 月于美国研究所

# MEIGUO YU 20 SHIJI YAZHOU DE CHONGTU HE ZHANZHENG

## 目 录

### 序言 / 陶文钊/1

### 美国外交史上的对外干预

——兼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美国对外干预的影响 / 王立新/1

国家安全需要、输出民主的理想和可接受的低代价预期构成当前和今后决定美国对外干预的三大要素。

### 美国公众舆论与战争

——以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为例 / 熊志勇/24

有人说,美国人怕死,因此怕打仗;或者说,战场上伤亡一大,美国民意就会反对战争,仗就打不下去,这两个命题是否准确?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 外务部的建立与 1905 年中美工约交涉 / 梁碧莹/36

1905 年,美国一方面以调停者的身份,在日俄战争中进行斡旋,从中渔利;另一方面又以欺凌者的身份,在国内加紧对在美华人的苛待甚至排斥,使排华暴行日益升级。

### 罗斯福的均势政策与中国东北的“完整”

——以日俄战争为中心探讨 / 朱卫斌/53

日俄战争时期,美国依然不时地要求列强尊重“中国完整”,但另一方面,罗斯福又主动牺牲“中国完整”原则。

### 美国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政策演变 / 秦 珊 / 69

为阻止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美国巧妙地以运输能力不足和中国国内



安定比出兵欧洲更为重要为借口，消极地抵制了中国军队赴欧参战。

### 美苏争霸与中国大连(1945年) / 张振江 王琛 / 86

1945年夏秋之际，作为反法西斯联合国的重要成员，并经过8年艰苦努力而取得胜利之际的中国政府，不但不能顺利接管脱离日本控制的中国东北，反而使其再次沦为美苏两国的竞争对象。

### 战后初期中国对日索赔中的美国因素

——以资源委员会与美国交往为中心 / 张维缜 / 98

战后初期(1945~1949年)，中国的对日索赔是当时远东国际关系的重大事件，但对日索赔的主导权却握在美国手中。赔与不赔，赔多少？中国说了没用，要由美国来定，而美国的态度却日益消极。

### 留美学生与民国外交 / 金光耀 / 108

民国时期著名外交官顾维钧说：中国有句大家普遍接受的古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外交上却不能接受这条。因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

### 朝鲜战争与国会战争决策权的变迁 / 刘学政 梅仁毅 / 120

美国的战争决策权由国会掌握，战争指挥权归总统，这是美国的宪法规定的。在朝鲜战争之前的历次重大战争中，战争决策权基本是由国会行使和控制的。然而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杜鲁门总统完全未与国会磋商，也未请国会批准就将美军投入了战斗，从而将美国引入了其历史上第一场既未宣战也未经国会批准的大规模战争中。

### 缓和的触角还是冷战的武器

——析美国政府60年代初期对中国粮荒的决策过程 / 牛大勇 / 130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遭遇粮荒。对是否向中国提供粮食，美国政府内部曾研讨过各种方案，并向中国伸出了试探的触角。中国政府不接受美国政府的“施舍”，但谋求通过国际贸易渠道从美国民间购买粮食。但肯尼迪总统权衡各种利害，放弃了松动对华贸易限制的打算。冷战政治压倒人道主义，中美关系失去了一次缓和的机会。

### “裂变”中苏与肯尼迪政府联印制华政策 / 温强 / 144

肯尼迪政府总喜欢用“零和游戏”决策模式来思考它的对华政策，换句话说，不管是美国的何种胜利，都意味着中国相应的损失与失败。

### “文革”时期的中美关系 / 姜振寰 / 162

中国十年“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而恰在这政治波动、经济失控、人心混乱的十年中，中国的外交却取得了巨大进展。





## 越南战争与当代美国自由主义的衰退 / 张立平 / 169

当代美国自由主义主要表现为:经济上的凯恩斯主义,政治上的平等主义,文化上的多元主义,道德上的相对主义,外交上的理想主义。美国当代自由主义的衰退过程,就是美国民主党势力的衰退、美国保守主义的上升、共和党势力加强的过程。

## 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核选择:决策与禁忌

——基于对有关解密文档的解读 / 汪伟民 / 181

关闭“核窗口”:约翰逊时期两次重大的核选择:1. 1964~1965 年的核讨论;2. 1968 年的溪山危机。尼克松政府的两次核选择:1. 流产的“鸭钩行动”;2. 1972 年春:寻求最后的一击。

## 力不从心——越战失败与美国接纳“难民” / 李晓岗 / 203

在南越政权急剧崩溃之际,美国接纳和重新安置越南难民的做法既不像在战后初期接纳战争难民那样,是为了显示自己在西欧的强权,也不像五六十年代接纳匈牙利、古巴难民那样,是为了扩大自己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强权,而是为了摆脱在南越进行的不人道的战争而进行的“人道行动”,其目的是以“道义”上的体面掩盖军事上的不体面。

## 1979 年中越边境冲突中的美中苏三角关系 / 宫力 /

邓小平说:在美国的时候,我就对卡特总统说,我们要教训一下越南,虽然我们当时的题目只是限制在中越边界范围内,但实际上不是从中越两国角度考虑,也不是从印支角度考虑,而是从亚洲,太平洋的角度,也是从整个全球战略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

## 反应与调整:1996 年台海危机与美国对台政策 / 吴心伯 / 228

1996 年 3 月,中国政府为震慑以李登辉为代表的台独势力,在台湾海峡举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演习,克林顿政府出于美国自身的战略利益考虑,向台海附近水域派出了两个航母战斗群。中美两军呈耸然对抗之势。

## 1995—1996 年台海风云及其影响 / 陶文钊 / 239

1996 年的台海事件对美国政策有着深远、复杂的影响。首先,此事件对克林顿政府和国会有一种强烈的警醒作用;其次,此事件使美国意识到台湾问题的敏感性,从而使美国对台湾问题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第三,此事件使美国感觉到,在台湾海峡地区仍有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因而加强了与台湾军方的关系;第四,此事件对日美安保同盟的“再定义”有一定影响。

自——态新时意由介航导主古国美双以变新史以的更态耐于长番故人国美  
御游治式行耐于国美权义主由

MEIGUO YU 20 SHIJI YAZHOU  
DE CHONGTU HE ZHANZHENG

## 美国外交史上的对外干预

### ——兼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美国对外干预的影响

国际政治中的对外干预是指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事务的主动干涉,这种干涉可能是针对某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也可能是针对该国的对外政策。<sup>①</sup> 根据干预的强弱程度不同,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干预可能包括从强度最低的旨在影响其内政的讲话到强度最高的直接军事入侵。大体说来,一个国家施行对外干预的手段包括六大类,即心理压力、经济手段、政治手段、秘密行动、准军事干预以及直接的军事威胁或入侵等等。

对外干预由于违背了关于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国际法准则,并经常成为极少数大国(特别是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常常遭到舆论的谴责。但是,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现实表明,尽管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仍为大多数国家所珍视,但是对外干预却有增无减,有的甚至得到联合国授权,而且当代国际法和人权观念的发展似乎正在赋予对外干预远比以前更多的合法性。对外干预性质的复杂性以及在当代国际政治中越来越突出的地位使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

近年来,学术界对国际政治中的对外干预问题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但重点是对外干预,特别是人道主义干预的国际法问题以及冷战后美国实施的干预行动。<sup>②</sup> 本文则试图从历史的视角考察美国外交上的对外干预,特别是

① Doris A. Graber, "Intervention and Nonintervention", Alexander DeConde, e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8), Vol. 2, p. 482.

② 国内学术界关于对外干预的研究主要是由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进行的,主要有:魏宗雷等著:《西方人道主义的干预与实践》,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时殷弘:《国际政治中的对外干预》,《美国研究》1996年第6期。西方学术界从国际法和国际政治理论的角度讨论对外干预的论著较多。



美国人对海外干预态度的历史演变以及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对美国干预行为的影响。

## 修道士:19世纪末以前美国对国际事务的态度

从建国伊始,美国的政治文化中就存在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干预其他国家事务的冲动。首先,作为一个在革命中诞生的新国家,美国具有很多“革命国家”普遍所具有的那种输出革命的激情,投身于独立战争的人普遍把自己的事业看成是为全人类的自由而战,相信美国革命所捍卫的原则具有普世性。其次,在建国之初,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共和国,处于欧洲专制制度的包围之中。对专制制度的疑惧和担心使美国人相信在一个专制的世界里,作为唯一的共和国的美国是无法生存下去的,美国自由的命运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世界其他地区自由的生长与发展,美国必须在全世界范围内捍卫和推广自由。<sup>①</sup> 其次,美国文化的清教起源和美国例外论的自我形象赋予美国一种强烈的使命意识,传播民主与捍卫自由不仅是出于自身安全的需要,也成为美国国家使命的一部分。同时,美国作为一个依靠普世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构建国家身份和建立国家认同的国家,极易在对外关系中表现出意识形态狂热,传播民主往往成为国家自豪感和国家凝聚力的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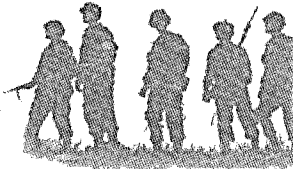
因此,作为革命者,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大多抱有以美国的意识形态改造世界的理想。潘恩在其《常识》一书中充满自信地说,“我们有能力重新建设世界”,<sup>②</sup>典型地反映了美国革命一代的抱负。建国初期美国人民对法国大革命的狂热激情和一批革命者奔赴法国支持革命的举动都表明这个新国家政治文化中所具有的乐于干预世界事务的特点。

与政治文化中强烈的干涉主义相对照,建国初期美国的国家安全形势则要求美国回避国际事务,特别是欧洲国家间的纠纷。乔治·华盛顿和大多数建国之父们视卷入外国的纷争,特别是欧洲战争为危险的事情。欧洲是由“没完没了相互争斗的国家”<sup>③</sup>组成的,是很多赴美移民极力逃离的

① 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一句话很典型地反映了美国人的这一思想:“自由恰好是这样一种东西:如果它只在地球上某一地方实行,则在那里恰恰得不到实行”。(美)斯蒂芬·安布罗斯,徐问铨等译:《艾森豪威尔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下册,第393页。

② 托马斯·潘恩,马清槐等译:《潘恩选集》,商业印书馆1982年版,第57页。

③ 杰斐逊语,转引自 Elliott Abrams, *Security and Sacrifice: Isolation, Intervent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Hudson Institute, 1995), p. 2.



地方。在殖民地时代,正是欧洲国家间的战争把北美拖入战祸之中,欧洲是危险的来源。而欧洲之所以危险则根本上在于欧洲各国的专制制度,正是君主之间为一己之私利而挑起战争,因此尽管美国不得不与欧洲各国进行贸易,但美国必须与欧洲没完没了的纷争保持距离。而卷入欧洲的事务则会把美国的“命运与欧洲任何地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从而把美国的“和平与繁荣陷入欧洲的野心、竞争、利益、好恶和反复无常的罗网里去”。<sup>①</sup>因此,与欧洲分离和不卷入就意味着安全,因为地理上的隔绝提供了天然的屏障,美国可以享受“免费的安全”。美国不卷入欧洲的事务不仅意味着国土安全,还意味着美国共和制度的安全,因为不卷入欧洲的事务就可以避免欧洲君主制度和贵族制度的熏染,美国可以集中开发美洲大陆,把美国建设为“一个自由、伟大的国家”,“为人类树立一个始终由正义和仁慈所指引的民族的高尚而新颖的榜样”。<sup>②</sup>

因此,从建国伊始,美国政治文化中通过输出民主干预国际事务的冲动与通过避开欧洲的纷争以确保美国安全的需要就出现一种张力。这种张力集中体现在联邦政府面对的第一个外交难题,即如何应对由法国大革命引起的欧洲战争。围绕美国对法国革命的态度、美国对法国承担的义务、美国对欧洲战争的政策等问题,以杰斐逊为一方,以汉密尔顿为另一方的两派政治势力展开激烈的辩论,辩论的结果是一种折中的选择:一方面避开欧洲的纷争以保证美国的安全,另一方面竭力在美洲树立一个共和典范来影响和改造世界。美国好比一个“修道士”,不问世间(欧洲)的事务,而专注于树立一个榜样。美国对外的干预至多体现在对外国政策的谴责上。华盛顿和汉密尔顿等人成功地消解了美国民众要求政府支持法国革命的激情,华盛顿在其告别词中更是把“在扩大我们的贸易关系时应尽可能避免政治上的联系”作为美国“对待外国应循的最高行动准则”而确定下来。<sup>③</sup>

从联邦政府成立一直到 19 世纪末,与欧洲分离,不干预国际事务,同时致力于北美大陆的扩张成为美国政治精英的共识。“民主和安全意味着让欧洲远离我们的事务和远离我们的邻居,同时我们也远离他们的事务。”<sup>④</sup>1823 年 11 月,约翰·昆西·亚当斯在致俄国的照会中宣称:美国“不怀有以武力传播美国政府赖以建立的原则的企图,也决不干涉欧洲的政治事务,同时期待和希望欧洲国家同样不要把它们的原则扩散到美洲”。<sup>⑤</sup>同年年底

① 《华盛顿选集》,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325 页。

② 《华盛顿选集》,第 322 页。

③ 《华盛顿选集》,第 324 页。

④ Abrams, *Security and Sacrifice: Isolation, Intervent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 3.

⑤ Charles F. Adams, ed., *Memoirs of John Quincy Adams, Comprising Portions of His Diary from 1795—1948*, (New York, 1970), Vol. 6, p. 194.



的门罗宣言使这一共识成为政策,门罗宣言中阐述的三大原则,即“美洲体系原则”,“互不干涉原则”和“不准殖民原则”实际上是反对任何欧洲列强干涉新大陆的警告和美国不打算参与欧洲政治的声明。宣言把欧洲国家“扩展其制度到西半球的企图”视为“对美国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突出了美国不干预政策所含有的维护共和制度安全的目的。<sup>①</sup>

大体说来,在美国建国后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并没有实施政治的和军事的对外干预,而且还在国际事务中积极倡导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乔治·华盛顿曾言:“我的政治学是简单和明白的。我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建立它认为能使自己生活得最幸福的政府形式;只要它不侵犯别国的任何权利,对别国没有危险,任何政府都不应干涉另一国的内政,除非是为了它们自己应该享有的安全。”<sup>②</sup>尤利希斯·格兰特总统在1869年12月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说:尽管美国人同情“所有为自由而斗争的人们……但为了我们的荣誉,我们应当避免把我们的观点强加给那些不情愿的国家,避免在没有受到邀请的情况下……介入各国政府与其臣民之间的争吵。”<sup>③</sup>美国在对其他国家的内政不满时至多给予道义上的关注,如国会曾通过决议对俄国和奥匈帝国迫害犹太人,土耳其屠杀亚美尼亚人和英国压迫爱尔兰人进行谴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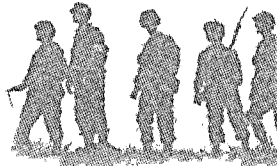
## 修道士还是传教士: 20世纪上半期美国对国际事务的矛盾心态

美国的对外军事干预始于1898年的美西战争。从整个美国对外干预的历史来看,美西战争并没有背离美国传统的对国际事务的态度,因为美西战争并没有改变乔治·华盛顿确立的不干预欧洲事务的原则,而是为了驱逐欧洲在拉美的影响,并确立美国在美洲的主宰地位。美西战争开始了美国干预拉美,主要是与美国邻近的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历史。美国最初论证其干预行为合法性的工具是1904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对门罗主义的延伸,即所谓的“罗斯福推论”(Roosevelt Corollary)中提出的所谓“国际警察”权。罗斯福称美国在西半球有权“行使国际警察的权利”,以制止

① Henry Steele Commager, ed., *Documents of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1958), Vol. 1, p. 236.

② 《资产阶级政治家关于人权、自由、平等、博爱言论选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29页。

③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Cycle of American History* (Boston, 1986), p. 93.



“西半球国家的恶行”。<sup>①</sup> 美国以自封的“国际警察”身份先后干涉古巴、巴拿马、海地、尼加拉瓜和圣多明各的事务。

除干涉拉美事务外,西奥多·罗斯福时期的美国还卷入了其他地区的国际政治。1905 年罗斯福通过倡议召开阿尔赫西拉斯会议,成功地调解了德国与法国围绕摩洛哥问题的纠纷,避免了一场军事对抗。同年罗斯福主持召开普利茅斯会议,调解日俄战争。罗斯福并因此获诺贝尔和平奖。在美国历史上,西奥多·罗斯福是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并深刻意识到美国的利益、安全和荣誉与世界政治息息相关的总统。

在伍德罗·威尔逊时期,美国在干预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事务时提出新的理由:教会他们如何“选举好人”,即建立民选的可信赖的政府。威尔逊不顾美国国务院官员和经济利益集团的反对,改变了美国长期坚持的承认事实上政府的政策,坚持拒绝承认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墨西哥韦尔塔政权,声称美国只承认具有立宪合法性的政府而不会承认一个“屠夫政府”。如果说信奉权力政治的罗斯福对拉美的干预主要是基于现实政治的话,威尔逊的干预则主要是基于理想政治。威尔逊对墨西哥和其他加勒比地区国家的干预实际上重新唤起了美国政治文化中输出民主的冲动。

20 世纪初期,美国对拉美和远东国际事务的广泛卷入逐渐侵蚀了美国传统的不卷入国外的纷争以及与大国冲突保持距离的政策,但这并不表明美国要放弃传统的不卷入欧洲政治的原则。当一战爆发时,多数美国人表现出的态度是厌恶和不屑,并竭力避免卷入战争。但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和德国外交大臣齐默尔曼的电报终于未能使美国远离“与美国没有任何关系,其原因也不能触动美国”(威尔逊语)<sup>②</sup>的战争。威尔逊对美国参战的解释除基于传统的安全理由,包括捍卫中立权利和维护领土安全外,还提出新的理由:使民主在世界上享有安全。他在致国会的宣战咨文中说:“当涉及世界和平和世界人民的自由的时候,中立不再是可行的和可取的,对和平与自由的威胁在于存在受有组织的势力支持的专制政府”,而德国就是这样的政府,“这一政府完全受这些势力的支配而不是其人民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中立走到了尽头。”威尔逊认为,德国这样的专制政府是“自由的天然敌人”,“除非通过民主国家的合作,否则稳固的、一致的和平永远不会到来”。<sup>③</sup>

① James. D. Richardson, compiled, *A Compilation of the Me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Bureau of National Literature, 1911), Vol. 16, p. 7053.

② Abrams, *Security and Sacrifice: Isolation, Intervent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 63.

③ Arthur Roy Leonard, ed., *War Addresses of Woodrow Wilson* (Boston: Ginn and Company, 1918), pp. 32—45.



威尔逊这番话实际上为美国的对外干涉提出了意识形态标准,美国的目标不仅仅是欧洲的和平,还包括欧洲的民主。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即内部治理结构与美国的安全相关,因为国内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威尔逊声称:“世界必需使民主享有安全,世界的和平必需建立在可信赖的政治自由的基础之上。”<sup>①</sup>他试图告诉美国人,美国的安全不再通过中立和与欧洲分离就能够得到保证,而要依赖于欧洲的稳定,而欧洲的稳定需要美国的卷入与干涉,卷入的目的不是加入欧洲的权力角逐,而是通过输出民主,让专制君主丧失权力和远离新的先进武器,只有这样美国才能获得持久的安全。

从美国与世界政治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威尔逊提出一个全新的国家安全理论,其核心在于:美国的安全只有通过卷入世界政治才能得到保护,而美国的卷入不应是为了恢复欧洲的均势,而是为了促进民主和建立一个基于自由国际主义原则的世界秩序。这是威尔逊留给 20 世纪美国外交的最重要遗产。基辛格曾评论说,罗斯福与威尔逊是带领美国走出孤立主义,走向国际事务的关键人物,但二人是“以相反的理念来解释美国走出孤立的原因”。西奥多·罗斯福是均势政治的老手,“坚持美国参与国际事务是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而“在威尔逊看来,美国是基于弥赛亚式的理由扮演国际角色:美国的义务不是维持均势,而是向全世界传播美国的原则”。<sup>②</sup>可以说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奠定了 20 世纪美国外交的两大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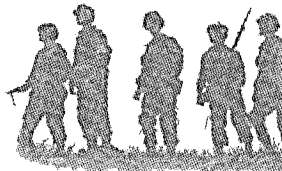
尽管罗斯福和威尔逊看到了美国卷入世界政治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但大部分美国国民却从一战中看到了美国卷入国际政治的危险和代价:战时对国内经济的管制和公民权利的限制;大约 13 万美国人的生命代价和 300 多亿美元的经济代价。<sup>③</sup> 20 世纪 30 年代成立的参议院调查军火商人是否进行院外活动以促使美国参战的奈委员会的报告又使美国民众相信,美国卷入一战是军火商即所谓的“死亡商人”操纵政府的结果,是一个悲剧性的大错误。就如支持孤立主义的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所言,美国既没有能保护其财产,也没有让民主在世界上享有安全,因为美国白白扔掉了数以百万计美元的贷款,而这只会使独裁者在世界上享有安全。<sup>④</sup> 因此无论从保卫美国安全还是从促进美国理想的角度,美国卷入一战都是个错误。美国民众在战后强烈反对美国参与国际事务,因此一战的结果不是刺激了美国对

① Leonard, ed., *War Addresses of Woodrow Wilson*, p. 42.

②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4 页。

③ Thomas G. Paterson and J. G. Haga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 History* (Lexington, Mass., 1983), Vol. 2, p. 293.

④ Paterson, et al,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 History*, Vol. 2, p. 326.



外干预的愿望,而是大大减弱了美国对外干预的热情。如果说,威尔逊要美国扮演“传教士”的角色的话,美国民众更愿意美国继续扮演“修道士”。对外干预,特别是军事干预遭到了民众强有力的抵制,甚至对美国传统势力范围——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干预也遭到舆论的谴责。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美国先后撤出了美国驻扎在多米尼加、尼加拉瓜和海地的海军陆战队。1927 年墨西哥对美国 and 外国石油公司国有化,美国出人意料地没有进行军事干涉。1929 年美国总统一再声明,美国不会用军事干涉手段保护美国在海外的财产,没有其他西半球国家的同意,美国不会对拉美国家进行干涉。<sup>①</sup>

一战之后,美国实际上面临一种两难:很多美国人认识到,美国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把自己孤立于国际体系和世界事务之外而享有安全,因为美国自身的安全已经不可避免地与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欧洲的稳定联系在一起;而民众舆论又强烈反对卷入国际体系和干预国际事务,因为正如一战表明的那样,这一体系极易把美国拖入战争之中。20 年代美国的外交决策者如查尔斯·休斯、依莱休·鲁特、弗兰克·凯洛格和史汀生虽然信奉国际主义思想,但行动上则异常谨慎,奉行一种极为有限的国际主义政策,简言之就是试图通过缔结多边国际条约,利用国际法和世界舆论的力量来维护世界和平,而规避美国的大国责任,拒绝采取政治和军事手段干预国际事务,因为这种有限的国际主义在他们看来至少在国内政治中是安全的。20 年代的美国外交深刻地反映了美国对卷入国际事务的矛盾心情:害怕卷入国际事务同时又担忧如果美国完全对欧洲事务不闻不问,欧洲会爆发另一场由分裂和混乱而导致的大战,最终美国可能也无法幸免。大萧条之后,美国传统的以孤立求安全的国家安全观念全面复活,反对卷入欧洲事务的孤立主义思想主导了美国的外交。绝大多数美国人相信美国可以像 19 世纪那样,通过与世界政治保持距离而获得安全。这一幻想最终在珍珠港的轰炸声中破灭了。

## 擎天的阿特拉斯(Atlas): 反共与冷战时期的对外干预

美国再次被迫卷入世界大战决定性地瓦解了美国人长期深信不疑的美

<sup>①</sup> 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40 页。





国可以远离世界政治的幻想,而且显示了沉醉于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多么地危险。威尔逊提出来的美国的安全和利益与世界秩序密不可分的观念被普遍接受。“自从美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以来,大多数美国人第一次开始明白他们的日常生活会受到海外发生的事情的深刻影响,他们国家至关重要的利益会受到其他地区国际权力格局变化的破坏”。<sup>①</sup> 这一点提供了战后美国走上全球干涉之路的最基本的思想背景。其次,苏联巨大实力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当时的广泛影响力,使美国人认为自己不仅面临传统的安全威胁,而且美国的生活方式和理想也遭到了挑战,而且两种危险比以前任何时候都相互交织在一起,美国建国之初所面临的输出民主与国家安全需要之间存在的那种张力第一次不存在了。换言之,无论是美国输出民主的理想需要,还是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美国都需要干预国际政治。因此,苏联作为美国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双重对手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使美国获得前所未有的干涉动力。第三,美国在战后频繁的对外干涉不仅与美苏冷战的性质有关,还与战后国际体系的性质有关,两极国际体系上演的是一种零合游戏,在这种零合游戏中,敌对双方必然是寸土必争,锱铢必较。正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68 号文件(NSC68)所说明的那样,“在目前两极权力格局的背景下,无论在什么地方自由制度的一次失败都是整个自由制度的失败”。<sup>②</sup> 在美国人看来,美国的安全与全球的安全已经无法区分,美国的安全似乎依赖于美国干预世界上每一场冲突。第四,所谓“慕尼黑教训”极大地阻遏了美国国内反对对外干预的力量,反对美国对外干预被视为对共产主义的“绥靖”而受到指责。因此,二战后美国对外干预的范围急剧扩大了。如果说,在此前美国主要是依据门罗主义对西半球进行干预,而冷战时代美国对外干预的地理界限至少在理论上已不复存在(尽管在实践中会有选择)。从杜鲁门主义到里根主义的一系列美国总统的主义,宣布的都是美国拥有自封的全球干涉的权利。因此在冷战时代,美国内部的分歧不再是美国是否应该卷入国际政治和实施对外干预,而在于美国准备付出多大的代价来进行干预和承担所谓的国际义务,即捍卫所谓的“自由世界”。

二战前美国主要利用门罗主义来论证美国对外干预的合法性和动员民众支持,在冷战时代反共主义代替了门罗主义。在美国官方蓄意的渲染和吓唬下,美国民众第一次普遍感到无论是美国的国土安全还是其生活方式都受到了威胁。没有民众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恐惧和敌视,决策者无法

① Robert E. Osgood, *Ideals and Self-Interest in America's Foreign Relation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 429.

② *FRUS*, 1950, Vol. 1, p. 240.